

譚嗣同哲學思想

楊榮國著

B254

3

人民出版社

譚嗣同哲學思想

楊榮國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122500

21104/16

譚嗣同哲學思想

楊榮國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工人日報印刷廠印刷 華新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frac{3}{4}$ · 字數 32,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2,500 定價 (7) 0.17元

統一書號 2001·92

封面設計者：馬艾庚 校對者：杜敬之等

目 次

(一) 譚嗣同的时代.....	1
(二) 譚嗣同的唯物論体系的“汎神論”的“汎仁論”思想	7
(甲) 唯物論体系的“汎神論”的“汎仁論”思想	9
(乙) 基于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感觉論而批判“名教”之 所謂“名”	14
(丙) 基于唯物論体系的倫理学的感觉論而批判“去人欲， 存天理”	18
(丁) 史的唯物論思想	21
(戊) 辟迷信与倡导科学	24
(己) 辯証的思想	26
(三) 譚嗣同的反封建經濟与促进資本主义 經濟的思想	31
(四) 譚嗣同的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想	38
(五) 結論	48

(一) 譚嗣同的时代

清朝反动统治者结合国际侵略势力，于一八六四年，把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扑灭了；在这革命政权行将被扑灭以前和以后，清朝反动统治者，说是为了謀所謂“自强”，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便陸續施行所謂“新政”。什么“新政”呢？这“新政”的实际，就是为了进一步屠杀人民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于是由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进行所謂洋务，先后开办了各种工厂——特别是軍用的工厂。

在这些工厂行将举办时，曾国藩一則說：“东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国船炮，剿賊必能得力。”^①再則說：“購成之后，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过一二年，火輪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逆，可以勤远略。”^②李鴻章亦如此說：“随时購買外洋槍炮，設局鑄造开花炮彈，以資攻剿。”^③根据以上他們的說話，他們表面上說“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資，自强之本”；^④实际上，就是为了屠杀人民和镇压人民的反抗。

① “曾国藩全集”第二册，奏稿卷二，复陈購買外洋船炮折，世界書局版。

② 同上。

③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鉄厂机器折。

④ 同上。

由于他們开办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發展生产，不是从發展生产中改善与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鎮压人民，所以他們对于民間的工業投資不仅不表示欢迎，反而給以極严的限制，所謂“中国富农大賈，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应“随时設法”予以“羈縻”；^①所謂对于商人只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設局”；^②因之，差不多所开办的工厂，不是官办，便是官督商办；在这情况之下，純粹民营資本是很难获得發展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这一“新政”所施行的結果，不仅沒有謀到“自强”——沒有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反而經甲申的中法战争到甲午的中日战争，——特别是甲午的中日战争，所表現出来的是可耻的失败——割地賠款，丧权辱国。而这一“割地賠款，丧权辱国”的总的归結，正說明了这洋务新政的总的破产。

现在要研究的，在这局限民間資本發展的洋务新政的大破产的过程中，——即一八九四到一八九八年的过程中，民营工商業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統計的資料：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到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这五年当中，中国新增加的工業的总投資——包括采矿、紡織、食品和其他工業，是二〇、八五二、九一四元，內中除官办或官商合办占五、五六九、九七四元，中外合办的占一、三九八、六〇二元以外，純粹民营的占多数，計占有一三、八八四、三三

① ② “李鴻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鉄厂机器折。

② 同上，奏稿卷四三，試办后布局折。

八元。^①

这个事实，說明这时中国純粹民营工業，虽在国际的資本帝国势力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由于民营工業家从艰苦中努力掙扎，故还有着一定的發展。

但是，我們若仔細探討，这一微弱的發展，只能說，由于甲午战争的失敗，宣布了那压制民营工商業抬头的洋务运动的总失敗；——这个，从当时对追究甲午战敗的責任的一般反映便可略知其梗概，这一般反映是：

“朝廷化了千万金錢，設立海軍，甲午一役，未及交綏，遽尔一敗塗地，推原禍始，不能不追究合肥（指李鴻章，因李为合肥人，当时洋务运动首要）之負国太甚。”^②

洋务运动总失敗了，关心国事的人从这一失敗的当中，又明确地認識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使中国富强，固然是要中国的工業得到發展；可是，要中国的工業得到發展，就不能由官家一手包办，就应该鼓励民营，奖励民营。在这普遍的工業民营的呼声之下，因而民营工業才稍稍获得一些發展。但，这一發展是極其微弱的，因为，不仅封建的枷鎖沒有解除，而資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反而愈甚，根据統計，即在甲午战争前，資本主义列强的投資，即达二亿至三亿美元。^③

同时，还有一点，在这甲午战争的前前后后，又是国际資

① 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93頁，科学出版社版。

② 李伯元著“文明小史”106頁，通俗文艺出版社版。

③ 吳承明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資”35頁，人民出版社版。

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方面轉化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阶段；因之，它們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便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是满足于对中国的商品輸出，就要求进一步，——要对中国进行資本的輸出；因為它們这时不只是商品有剩余，連資本亦有了剩余，所以它們正施其鬼域伎倆，从把資本对中国的輸出中，借以进一步来控制中国，而达到它們瓜分中国的目的。下面就是它們在这个陰謀下对中国进行了一連串的势力范围的划分：

一八九六年，通过中俄密約，北滿就成为帝俄的势力范围；

一八九七年，德国占領青島，并取得胶州灣“租借地”，因而山东就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一八九八年，英德协定，規定津浦鐵路，北段屬德国的势力范围，南段則屬英国的势力范围。

这一切现实情况激蕩着譚嗣同的思想，在他的言論中常有反映：

一八九五年中日和約中的“通商各条”，——譚嗣同写道——“将兵权利权商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土貨。”^①

日本的资本主义之走上帝国主义阶段是在二十世紀初，这时的日本是尚未走上这一步，可是，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是急速地向帝国主义方面轉化。同时，当时的英美，为了防止帝

① “譚嗣同全集” 289 頁，三联書店版。以下簡稱“全集”。

俄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故亦努力支持日本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

“大可駭者，——譚嗣同又写道——中国胶案既出之后，六大国皆移师，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①

对于资本主义列强自身的这一本质上的变化，当时的譚嗣同，自然不可能有所理解；但是，它们要在中国建立工厂，要瓜分中国的这一危机，譚嗣同是認識到了的。

同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势力通过对中国的贷款——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中日和約以来的贷款，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紧相勾結起来，向中国人民大肆进攻，比如：天主“教士”，不是經常“挾制官长，欺压平民”嗎？^②因而激起了中国各地人民的强烈的反抗——表現的方式，就是接二連三發生的所謂“教案”。

因而，中国人民在这双重势力的加紧进攻之下，便进一步走向貧穷化。

当时民間流傳着两句話：“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間荒。”^③上一句是指洋务运动头子李鴻章（李是合肥人）。李鴻章他們一群人办理的洋务，勾結资本主义列强势力，压制民營工商業，使之無从發展，同时还导致农村經濟更进一步破产，使广大的农民無以为生。下一句是指翁同和（翁是常熟

① “全集” 127 頁。

②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345頁，袁昶撰“乱中日記殘稿”，神州国光社版。

③ “全集” 291 頁。

人)。翁同和当时作戶部尚書，戶部尚書是要兼管漕糧田賦，兼“司农”的，由于所收的田糧賦稅太重，致使人民生活不了。

从这两句流行的話当中，我們可以見到当时人民在这双重的压迫之下所受的剝削的严重。

“司农告匱，——譚嗣同亦这样报道着說：——外庫搜括無遺，下而劝捐勸捐，房捐商捐，加稅加厘，息借洋款，息借民財，名目杂出，剔脂鑽髓。”[⊖]

这是当时全国的总的情况。

这一总的情况影响之下，当时湖南的反映是：

除了守旧势力一面嫉視和对抗新势力的發展，另一面則仍在那里“惟差缺之肥瘠是問”，还在那里“以歌以舞，以邀以嬉”[⊖]以外，一般爱国的志士和爱国的群众則發出如下的呼吁：

(1)德国“必索山东全省”而要变成德国的版圖，我們怎样办？

(2)帝俄要“以一旅兵收东三省直隶山陝”，我們又怎样办？

(3)法国派使来“索云貴两广”，我們如何拒絕？

(4)英国要“以一紙書”来“取楚蜀吳越”，我們又如何拒絕？[⊖]

湖南人民对甲午战争的失敗，就已極為憤慨！現在又經

⊖ “全集”290頁。

⊖ 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145頁，中華書局版。

⊖ 同上。

过这一連串的資本主义列强势力的深入侵略，更是怒不可遏！因之，在民間發生的情况是：“洋人往游历者动見杀害”，——予侵略者以当面的打击；另一面“志士仁人”則“都作亡后之圖，思保湖南之独立”，——就是万一国家亡了，准备以湖南为根据地繼續进行抵抗。⊖从这里，我們見到了他們对侵略者如何憤怒，極思有以抵抗，同时，也見到了他們爱国之殷切。

譚嗣同(1865—1898)是湖南浏陽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自身也是一个官僚地主——他是江苏候补知府；因之他的思想必然的要帶着他阶级的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时代所給予他的刺激很大，——特别是“自甲午战争后”，他不是“益發憤提倡新学”嗎？⊙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識又給予他若干影响，又加上王船山、黃梨洲諸人的思想所給予的熏陶，——尤其是王船山的“道器論”思想所給予的影响特別大，所以他虽終其身于戊戌变法，但从他在戊戌运动中的表現，不論言論和行动，他是屬於激进而潜存有革命傾向的一派。

(二) 譚嗣同的唯物論体系的“泛神論”的 “泛仁論”思想

在談譚嗣同的哲学思想以前，我們得首先探討的，就是譚嗣同的思想淵源——他所受的思想影响。

我們知道，譚嗣同的思想是仁学，但构成他这一仁学思想

⊖ 前一句見戊戌政变記 130 頁，后一句見同書 138 頁。

⊙ 同上，106 頁，譚嗣同傳。

体系，除了时代所給予的影响以外，在思想渊源方面，他自己在“仁学”的界說中有一番清晰的介紹。

“凡为仁学者”，——他这样写道：——“于佛書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当通新約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書；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礼記、孟子、庄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陆子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

“算学即不深”，——他又写道：——“而不可不習几何学，盖論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門徑在是矣。”

他說要通“仁学”，必需了解这許多家的思想；那也就是說，这許多家的思想，亦即是嗣同思想的渊源所自。可是，在上述許多家的思想中，有唯心論，也有唯物論；有宗教思想，也有自然科学，是多种多样的；譚嗣同在吸取中却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凡与仁学思想体系相乖离的予以批判，而合适的則予以吸取。

比如，他說：为了要說明“中外通”，則“多取其义于春秋”；要說明“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則“多取其义于易”；要說明“人我通”，則“多取其义于佛經”。[⊙]簡明的說：从这許多的著作中，他所吸取的，只是其中的那合乎仁学主旨的相通之义。从这里，便可見他接受前人思想的中心与原則。

自然，如前所述，給予譚嗣同思想影响較大的，自是張橫渠王船山和黃梨洲諸人的思想，其中特別是王船山的道器論

⊙ 按即生理学，“全集”133頁，有“論全体学”一文。

⊖ 見“全集”仁学卷上界說。

和黄梨洲的政治論所給予的影响尤大；可以說，譚嗣同的全部著作貫徹了他們思想的影响。

从而，在自然科学中，因他究心于“天文格致”，[⊙]故对于物理学中之以太学、电学和力学，結合“仁”的思想，他亦作了有力的發揮和闡述。

由是，而形成了他的仁学思想的体系。

至于他的仁学思想的實質是什么，以及他倡导仁学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則待以下分別研究。

（甲）唯物論体系的“汎神論”的“汎仁論”思想

嗣同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前已說明了。他的“仁”观念，是唯心，还是唯物？

嗣同曾說：这“仁”是“以太”，是“电”，“其显于用”，才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

这意思很明白，即“以太”是“仁”之体，“仁”是“以太”之用，体用是一元的。

体用是一元，这“一元”的本体是“以太”，那么，这“一元”便是物質；——即物質是“仁”之体，“仁”是物質之用。这物質的从“显于用”——即从显露于外的当中，則表現为精神的东西。且这表現于外的精神的东西，从他的說法，除“仁”“元”“性”外，如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耶教的“灵魂”和物理学家所謂“爱力”“吸力”等等都是。

⊙ 見“全集”仁学卷上界說，525頁，梁啓超所撰之譚嗣同傳。

⊙ “全集”9頁。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曾說：這作為“仁”的本體的“以太”，是“無所不胶粘，不貫洽”而充滿在宇宙間的；因而，這“無所不胶粘，不貫洽”的“以太”，人類固不必說，就是其他動物植物和礦物，自也就是這“以太”的結晶。是故這“顯于用”的“仁”，亦表現于任何具體物的當中——不論動物植物甚或礦物都有這種“仁”的精神之显现，只是所显现出來的，各有形態上程度的不同罷了。①

簡明的說：宇宙間是充滿着“以太”的，而宇宙間任何具體的物也都是這“以太”的結晶；因之，各各不同的具體的物，都有各各不同形態不同程度的“仁”的精神之显现。

因之，譚嗣同的所謂“仁”，從它的內涵來說，是“以太”，是物質；但是，從它的显露于外，則是“仁”，是精神。亦因之，他的所謂“仁”，我們又可以這樣說，是物質，又是精神。

如是說來，譚嗣同的“仁”的觀點，是汎神論的“汎仁論”的觀點，——這觀點是屬於唯物論體系的。

中國之所以具有這種屬於唯物論體系的“汎仁論”觀點，一面真是從艱苦掙扎中稍稍獲得微弱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所給予的影響；另一面，前已提到過，除他所吸取的西洋科學知識外，王船山“道不離器”“道寓于器”之說所給予他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

道必出于器而后有實用；——譚嗣同寫道——果非空漠

① “全集”26頁。

無物之中有所謂道”；可是，“今人所謂道”，說是“不依于器”，故“特遁于空虛”。[⊖]

他受了王船山這一思想的影响，反对“道”“遁于空虛”，所以他肯定这“仁”的本体是“以太”，“以太”之“显于用”，才是“仁”的精神，因之不能把“仁”說成是“空漠無物”，而是有物的實質的。

他吸取其他諸家的思想，亦就是如前所說，是从批判中吸取那“显于用”的“仁”的思想，如：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耶教的“灵魂”和物理学家的“爱力”“吸力”等等，——这許多，在他認為，就是“仁”，就是各个物自体所“显于用”的“仁”。“仁”有相通的意义，“兼爱”“慈悲”“灵魂”和“爱力”“吸力”等，亦有相通的意义，把这許多所吸取的，融化，改造，而形成了他那屬於唯物論体系的“汎仁論”的哲学思想。

可是，嗣同的哲学思想，虽屬唯物論体系，但为什么是“汎仁論”的，为什么这样強調“仁”，——把“仁”作了透辟的發揮？

談到这一点，得探討一下时代發展中所遭受的种种局限。

当时，民营工商業为什么不能順利地开展呢？农村經濟为什么破产，农民生活为什么無着的呢？人們的理性又为什么不能获得自由發揮呢？

这个，就是譚嗣同从时代的体驗中所考虑到的一些問題。

他从考虑中，他認為：其所以一切不能获得开展，——这

⊖ “全集”292頁。

个，就是由于“中外不通”、“上下不通”和“男女内外不通”所致。总的说来，就是由于“人我不通”所致。①

因而，他倡导，他發揮那“显于用”的“仁”。

从他的發揮中，使我們更为明确的，就是他之認定“以太”是“仁”之体，“电”是“仁”之体，因为“以太”之“显于用”是仁通，“电”之“显于用”，亦是仁通。

話又說回来，当时的情况，为什么会“人我不通”？

他認為：主要的，就是那“名教”的思想所給予人的局限。

因为“名者”是“由人創造”，便利“上以制其下”的；——譚嗣同写道——于是乎“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这么一来，所有的所謂卑者賤者，均受制于名，人我又怎么会相通呢？②

这里，值得注意的：

第一，譚嗣同公开的对于“名教”思想提出批判；这，給予当时封建頑固势力自是一个大的震动；另一面，自然也使一般人从“名教”思想的迷惑中稍有所覺醒。

第二，客觀唯心論者程、朱（宋儒程顥、程頤、朱熹）認定“理在事上”，而“名”又为“理”所从出，故“名”是客觀的东西，“名教”是天經地义，但譚嗣同則指出，那所謂“名”并不是什么客觀的东西，是“由人創造”，是主觀的——既是主觀的东西，那么，自不能說是什么天經地义。

第三，从譚嗣同的話中可以看出，程朱的“名教”思想之所

① “全集”6頁。

② 同上，14頁。

以为封建专制主义者所欢迎，因为这个是很好的“箝制之器”，便利他們“以制其下”。[⊖]

体会譚嗣同这話的总的精神，譚嗣同就是要从反“名教”思想的束荷中，亦即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中，使人們获得理性的充分自由。

要求理性的充分自由，这是当时新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同时也即是当时一切受压迫者的呼声。

“以太”是流通的，“电”也是流通的，故“以太”与“电”为“仁”之体，而“其显于用”的“仁”，自不能是“麻木不仁”，自也是“相仁”的——所謂“相人偶”。而“仁”又是与“知”关联着的，故“知不知之辨”，即在于“仁不仁”。[⊖]“仁”即是“知”，“不仁”即是“不知”；故發揮“仁”的道理，即發揮“知”的道理。而“知”又即是“理性”，故發揮“知”，亦即要發揮人們的理性。譚嗣同就是要从反“名教”思想的束荷中，亦即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中，来發揮人們的理性。

由是而知，嗣同的唯物論体系的汎仁論思想，其主旨，就在于打破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就在于打破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者用以桎梏人民的名教，从而求得人們理性之自由与解放。

⊖ “全集”15頁。

⊖ 同上，13頁。